

# 云南昭通市朱提故城遗址 2022—2023年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昭通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昭阳区博物馆

**关键词：**云南昭通市 朱提故城 城门 建筑基址 汉晋时期

**KEYWORDS:** Zhaotong City, Yunnan Shushi Ancient City City Gate Building Foundations Han through Jin Periods

**ABSTRACT:** From 2022 to 2023,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t al. conducted systematic excavations of city site remain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hushi ancient city in Zhaoyang District, Zhaotong City, Yunnan Province. Remains including the city wall and ancillary facilities, building foundations within the city, and water wells were discovered. Unearthed artifacts include pottery, bronze objects, coins, wooden slips, and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such as bricks and tile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mains, the city site is dated to the Han through Jin periods, with initial construction dating approximately to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remaining relatively prosperous until the Shu-Han period. These excavations have preliminarily clarified issues regarding site selection rationale, form and layout, construction sequence,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Shushi ancient city.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ing the jurisdic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by the central dynasties during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as well a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cient Southern Silk Road in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region.

朱提故城遗址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永乐社区诸葛营村，西距昭通市区约1.5公里，东南侧紧邻昭通机场；所在地点地处滇东北昭鲁盆地东部，为滇、黔、川三省交汇地带（图一）。遗址原名诸葛营遗址，于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专门调查与勘探，大致确定了遗址范围，并发现城墙、城壕等遗存，判定其为汉晋时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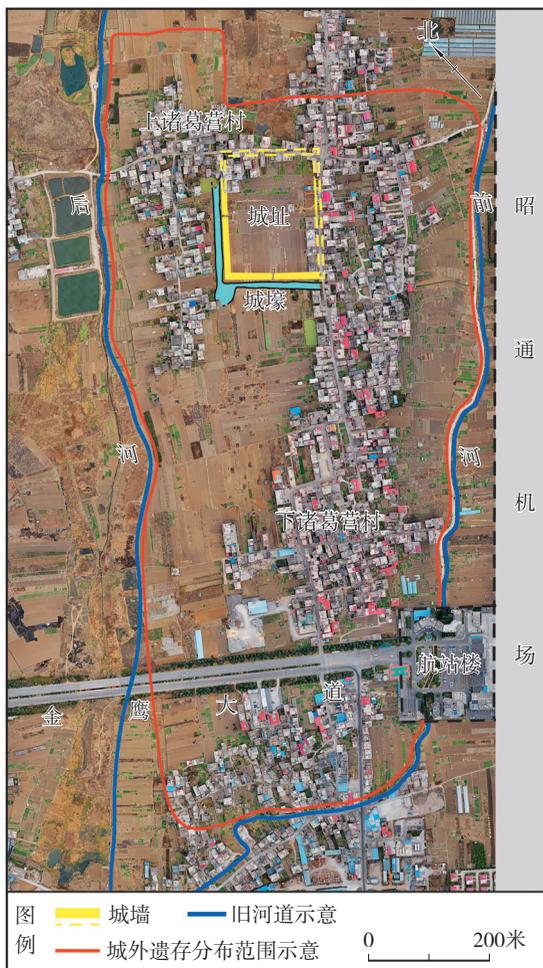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朱提县治所<sup>[1]</sup>。2019年10月，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正式命名为朱提故城遗址。

遗址东、西两侧原各有一条自北向南的旧河道，分别称前河和后河，二者在遗址西南不远处交汇。遗址位于两河中间的高地上，中部相对平坦，两侧呈缓坡状渐低，直至河道处。遗址整体地势北高南低，近几年的进一步调查和勘探显示，其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现地表主要为农田和建筑，连接机场和市区的金鹰大道从遗址南部横穿。遗址范围内分布有城址以及城外建筑和冶铁等手工业遗存。城址位于遗址北部，平面近长方形，南北轴线方向约40度。经过2022年以来的发掘确认，以城墙内侧计算，城址南北长约210、东西宽约155米，城内面积约3.3万平方米。城址四周城墙地表部分大多已毁，仅局部尚存略高出地面的少许痕迹；东、北两墙位置现为村中道路叠压，路两侧建有民居；西、南两墙位置处被大量现代坟叠压。城内除东部和北部分布一些民居外，现大部为农田(图二)。

为加强对朱提故城遗址的保护，并推进相关学术研究，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从2022年开始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其中2022年和2023年揭露面积共约1600平方米，发现城墙、城壕、城门及城内建筑基址、水井等多处遗迹，出土大批各类遗物。此外，在城外东南方向靠近机场旁也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有同时期的冶铁遗存。现将两个年度的城址主要发掘收获简报如下，城址外工作另文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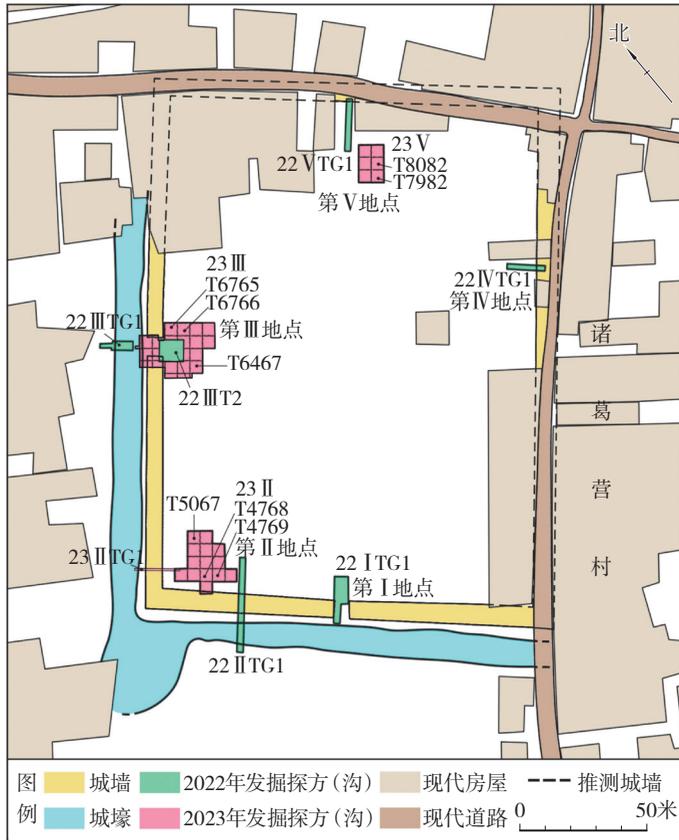
图二 朱提故城遗址正射影像

## 一、发掘概况

城址位于遗址区北部，地势平坦且较周围略高，四边城墙外侧地面高度均不同程度降低。发掘分 I—V 共 5 个地点进行，主要按探方法发掘。布设 5 米 × 5 米探方（部分仅发掘局部），方向为 40 度（根据地形及城址方向而定），同时局部以探沟形式对城墙和城壕进行解剖发掘（图三）。

### （一）第 I 地点

位于城址南部。2022 年布设南北向探沟 1 条（22 ITG1），长 11.25、宽 2.5 米，后北部扩宽至 6 米。发掘清理出砖砌排水渠、红烧土堆积、道路等遗迹，推



图三 2022—2023年发掘地点及探方分布图

测此处为南城门所在，但因拟扩方区域被现代坟叠压，故暂停此地点发掘。

### （二）第Ⅱ地点

位于城址西南部。2022年布设南北向探沟1条（22ⅡTG1），长38、宽2米。通过对南城墙（NCQ1）进行解剖发掘，初步了解南城墙的修筑方式，并发现其晚期存在修补现象。另于城墙外侧和内侧分别发现壕沟和疑似建筑礫墩等遗迹。2023年于城墙内侧布设14个探方进行发掘，发现建筑基址；又于西城墙南段位置布设东西向探沟1条（23ⅡTG1），长16.6、宽1米，对西城墙（XCQ2）进行解剖发掘（图四）。现以T4768、T4769北壁剖面为例，介绍第Ⅱ地点地层堆积情况（图五）。

第1层：耕土层。厚0.25—0.33米。

第2层：红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植物根茎、红烧土颗粒、炭屑及砾石等。最厚处0.18米。为晚期扰土层。

第3层：灰黑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砾石、炭屑等。厚0.3—0.35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片、陶网坠、铜箭簇、铜五铢钱等。

第3层下为黄褐色土，并发现23F2等遗迹，未向下发掘。

### （三）第Ⅲ地点

位于城址西部。2022年布设探沟2条。其中一条探沟内发现疑似城门遗迹，后扩为不规则探方（22ⅢT2），局部揭露西城门等遗迹；另一条探沟（22ⅢTG1）长13.45、东部宽4、西部宽2米，对西城墙外壕沟进行解剖发掘。

2023年于本发掘地点正式布设探方22个，完整揭露了西城门及其附属设施（图六）。现以T6765、T6766北壁剖面为例，介绍第Ⅲ地点地层堆积情况（图七）。

第1层：耕土层。厚0.17—0.4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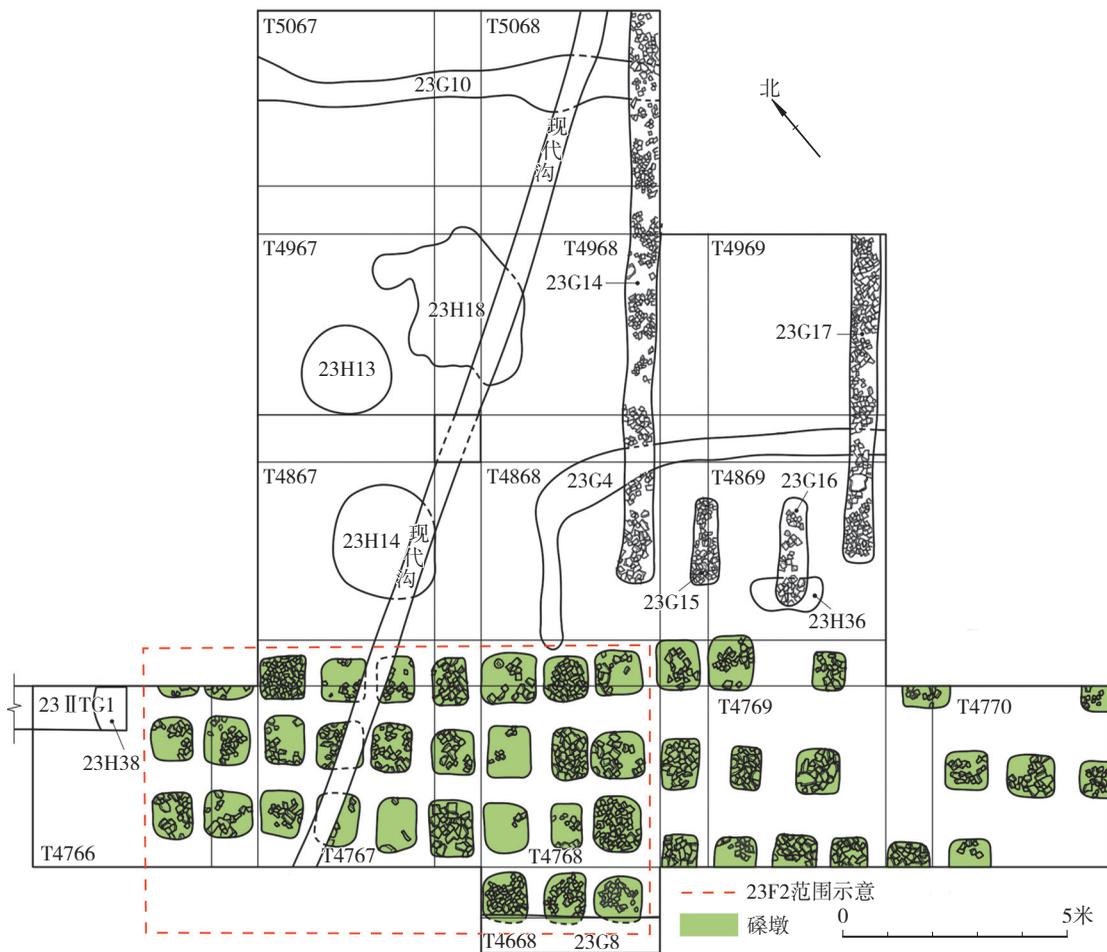
第2层：灰黑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植物根茎、红烧土颗粒、炭屑。最厚处0.32米。出土陶绳纹瓦片。为晚期扰土层。

第3层：灰褐色泛红黏土，质地致密，夹杂红烧土颗粒、砾石、炭屑等。最厚处0.5米。出土陶绳纹瓦片等。仅分布于靠近城墙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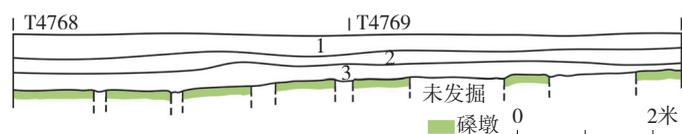
第3层下主要为较致密灰黑色土，并发现23F1等遗迹，未向下发掘。

### （四）第Ⅳ地点

位于城址东部。2022年布设东西向探沟1条（22ⅣTG1），长15、宽2米，



图四 第Ⅱ地点探方及遗迹分布平面图



图五 第Ⅱ地点T4768、T4769北壁地层剖面图  
1.耕土层 2.红色黏土 3.灰黑色黏土

以确认东城墙（DCQ1）位置并对其进行解剖发掘，发现东城墙存在基槽结构，晚期又对墙体进行简单修补。现以22IVTG1北壁剖面为例，介绍第Ⅳ地点地层堆积情况（图八）。

第1层：耕土层。厚0.28—0.34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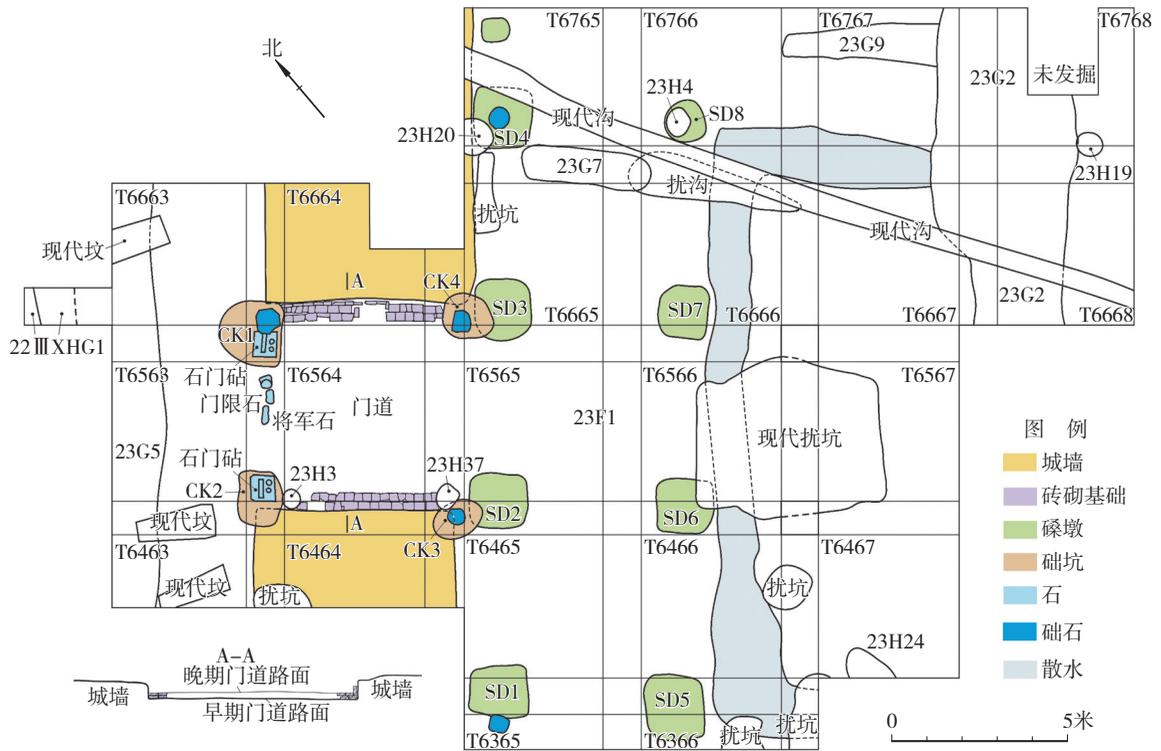
第2层：红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植物根茎、砾石等。最厚处0.22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片等。为晚期扰土层。

第3层：黑褐色黏土，质地较疏松，夹杂砾石和炭屑。最厚处0.28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黑陶和灰陶片、铜泡钉、铜镜残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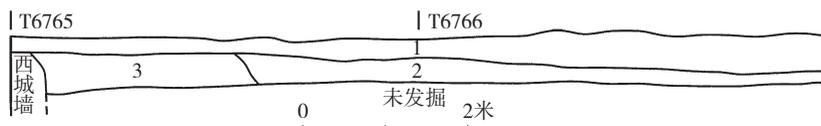
第4层：黑褐色黏土，质地较疏松，夹杂砾石和炭屑。最厚处0.25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黑陶和灰陶片、夹砂灰陶片。

第5层：红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砾石和白膏泥。最厚处0.4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片等。

第6层：浅褐色黏土，质地较疏松，夹杂炭屑。最厚处0.52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片、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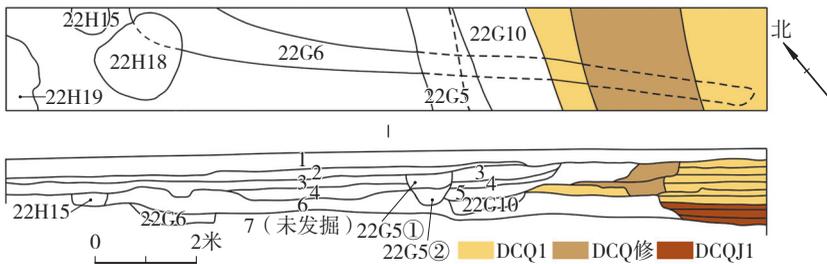


图六 第三地点探方、遗迹分布平面及局部剖面图



图七 第三地点T6765、T6766北壁地层剖面图

1.耕土层 2.灰黑色黏土 3.灰褐色泛红黏土



图八 第四地点22VTG1平、剖面图

1.耕土层 2、5.红褐色黏土 3、4.黑褐色黏土 6.浅灰褐色黏土 7.黄褐色黏土  
玻璃耳珰、玻璃珠等。

第7层：黄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纯净。出土少量泥质灰陶片、动物骨骼等。本探方壁此层未发掘。

第7层下为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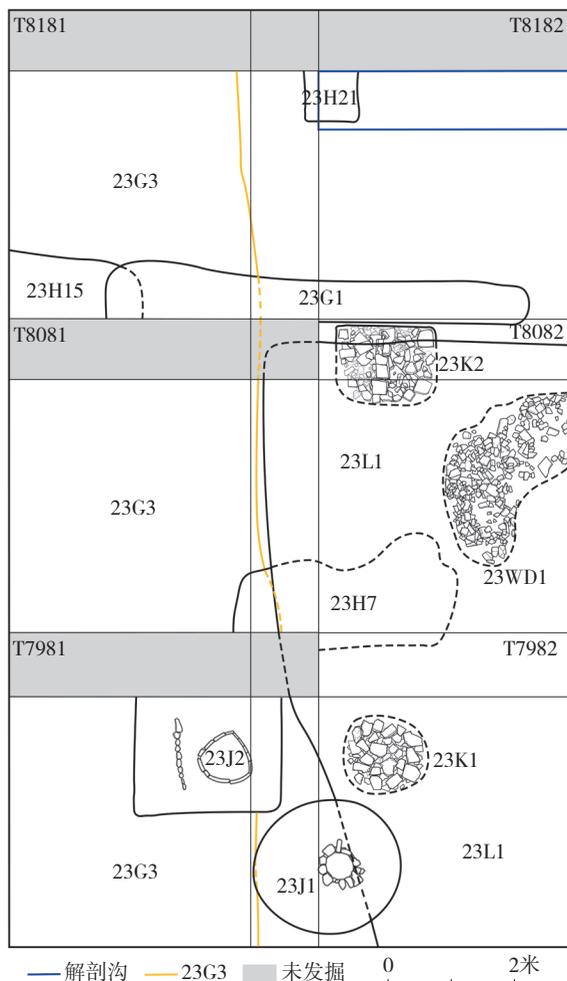
#### (五) 第五地点

位于城址北部。2022年布设南北向

探沟1条(22VTG1)，长21、宽2米，发现北城墙(BCQ1)，该城墙同样存在基槽结构。2023年于22VTG1东南侧布设探方6个，发现并清理城内壕沟、水井等遗迹(图九)。现以T8181、T8182北壁剖面为例，介绍第五地点地层堆积情况(图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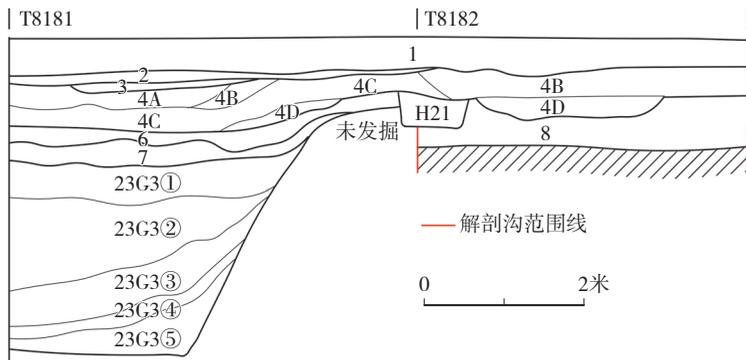
第1层：耕土层。厚0.39—0.48米。

第2层：灰黑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植物根茎、红烧土颗粒、炭屑及砾石等。厚0.08—0.12米。出土陶绳纹瓦片、陶瓦当、残铜器、铜五铢钱等。为晚期扰土层。



图九 第V地点探方及遗迹平面分布图

第3层：灰色泛黄黏土，质地较疏松，夹杂植物根茎、炭屑。厚0.13—0.22米。出土陶绳纹瓦片。



图一〇 第V地点T8181、T8182北壁地层剖面图  
1.耕土层 2、7.灰黑色黏土 3.灰色泛黄黏土 4A.灰褐色黏土 4B、4D.深黄褐色黏土 4C、8.黄褐色黏土 6.黄褐色泛灰黏土

第4层，厚0.2—0.7米，分4小层。

第4A层：灰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炭屑。厚0.17—0.28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片、陶网坠、铜箭簇等。

第4B层：深黄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炭屑、红烧土颗粒。厚0.24—0.45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片。

第4C层：黄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炭屑、白膏泥块。厚0.2—0.32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片、残铜器、铜箭簇等。

第4D层：深黄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包含物极少。最厚处0.25米。

第5层：灰黑色黏土，质地较疏松，夹杂炭屑，包含少量动物骨骼。本探方壁不见此层。

第6层：黄褐色泛灰黏土，质地较致密，夹杂炭屑和红烧土颗粒。厚0.09—0.28米。出土陶绳纹瓦片、泥质灰陶片、残铜器、陶模等。

第7层：灰黑色黏土，质地较疏松，夹杂炭屑、红烧土颗粒、白膏泥块等，包含物较少。最厚处0.35米。

第8层：黄褐色黏土，质地较致密、纯净，偶见红烧土颗粒。厚0.65米。

第8层下为生土。

## 二、主要遗迹

2022—2023年发掘的遗迹主要有城墙、城

门、城外壕沟、城内壕沟、建筑基址、水井、道路、灰坑、沟等。以下择要介绍。

### （一）城墙

遗址城墙整体保存较差，地表部分大部不存，仅局部残存少许痕迹。此处分别以23ⅡTG1、22ⅤTG1内的遗迹为例，对西、北城墙介绍如下。

1.西城墙 在城址第Ⅱ地点西部东西向探沟23ⅡTG1中部发现西城墙南段（XCQ2）。探沟北壁剖面所见城墙叠压于耕土层下，顶部现存宽5.1、底部现存宽11.3、残高1.36米。现存部分横截面呈梯形，为分层夯筑而成，平地起建于探沟第9层之上，未见基槽。夯层较密，大致呈水平状，每层厚0.16—0.25米，表面未见夯窝，其内偶见细碎陶绳纹瓦片。夯土以黄褐色、灰褐色砂土为主，质地较致密，且纯净细腻，极少见包含物。墙体东、西两侧现呈缓坡状，均夹杂大量红烧土块、炭屑、砾石且包含陶绳纹瓦片、残砖块的红褐色杂土呈斜坡状叠压，杂土未经夯打，推测与晚期以简单堆筑方式对城墙进行修补有关。城墙叠压的探沟第9、10层为较纯净、致密的黄褐色黏土，包含物较少，为人工夯筑而成（图一一）。相同的黄褐色黏土也见于第Ⅱ地点南城墙NCQ1和第Ⅳ地点东城墙DCQ1之下，其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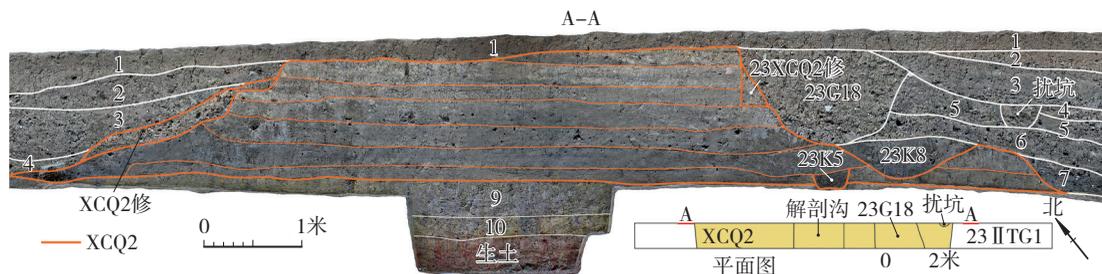
偶见陶片和动物骨骼。

2.北城墙 在城址第Ⅴ地点北部南北向探沟22ⅤTG1北端，发现北城墙中段（BCQ1）内侧局部，城墙其余部分延伸出探沟，被现代道路叠压。探沟西壁剖面所见城墙叠压于耕土层下，墙下有下挖的基槽（BCQJ1）。基槽打破探沟4层以下地层直至生土，已发掘部分南北宽3.5、深1.5米。城墙建于基槽之上，发掘部分宽4.2、高0.5米。城墙及基槽内垫土均分层夯筑而成，夯层较密，大致呈水平状，其中基槽内垫土有9层，每层厚约0.16米，夯土以黄褐色砂土为主，夹杂灰黑色土以及少量灰白色膏泥和小石块；城墙夯土有3层，每层亦厚约0.16米，夯土以黄褐色砂土为主，较密且纯净细腻，少见包含物（图一二）。

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发掘可知，城址四周城墙均筑造于早期地层之上，其中东、北城墙底部还下挖基槽，基槽打破早期地层。从包含物看，被叠压或打破的早期地层均不晚于汉代。是否挖基槽，推测与地形有关，地势平坦的地方直接于地面起墙，反之则需要先挖出一个底部较为平整的基槽，夯实后再向上夯筑墙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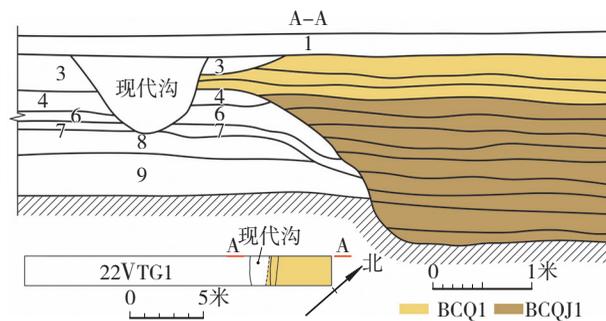
### （二）城外壕沟

此次还分别对西城墙和南城墙外的壕



图一一 23ⅡTG1内西城墙（XCQ2）平、剖面图

1.耕土层 2.灰褐色泛红黏土 3、6.灰黑色黏土 4.黄褐色泛灰黏土 5.灰褐色黏土 7.黑色泛黄黏土  
9.黄色泛灰黏土 10.黄色黏土



图一— 22VTG1北城墙(BCQ1)平、剖面图

- 1.耕土层 3.灰黑色黏土 4.黄褐色黏土 6.灰色泛黄黏土  
7.灰褐色黏土 8.黄褐色黏土 9.黑褐色黏土

沟进行解剖发掘。两处壕沟的情况较为接近,此处以西城墙外壕沟为例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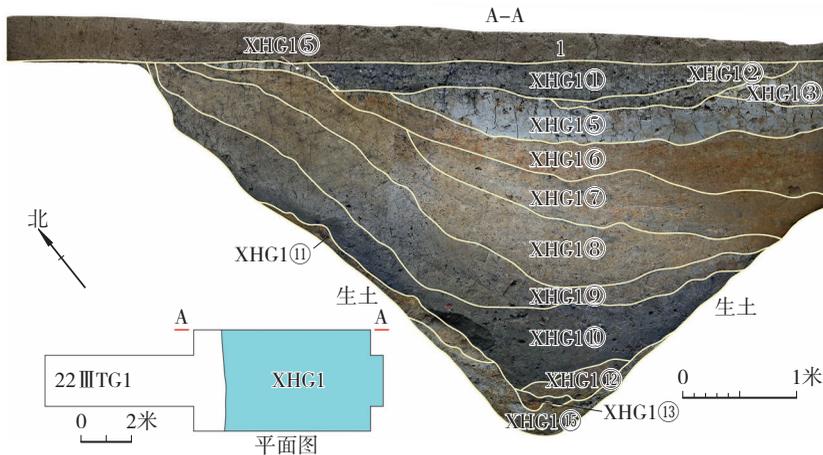
在城址第Ⅲ地点西部东西向探沟22ⅢTG1内发现壕沟XHG1,从位置判断应为西城墙外城壕,其位置大致与西城门对应。因现代坟叠压,城壕东侧即靠近城墙一侧有少部分区域未发掘。城壕叠压于耕土层下,发掘部分东西宽7.5米。城壕横截面近“V”形,沟壁斜直,深3.53米。从城壕东壁走势看,城壕口部宽约9.4、距西城墙约5.4米。壕沟内堆积可分为15层,土质多较致密。第①层为黑色砂质黏土,出土陶绳纹瓦片、砖块、泥质灰陶片等。第②层为青灰色砂质黏土,出土陶绳纹瓦片、云纹瓦当、砖块、泥质灰陶片等。第③层为灰白色膏泥夹杂黄褐、红褐色膏泥,出土陶绳纹瓦片、砖块、泥质灰陶片、炼渣等。第④层为黄褐色黏土,较疏松,出土陶绳纹瓦片、云纹瓦当。第⑤层为灰白色膏泥夹杂黄褐、红色膏泥,出土少量动物骨骼。第⑥层为黄褐色黏土夹杂红色、灰色黏土及灰白色膏泥,出土陶绳纹瓦片、炼渣、动物骨骼等。第⑦层为黄褐色黏土夹杂红色、灰色黏土,出土夹砂黑陶、红陶和泥质灰陶片,以及陶绳纹瓦片、炼渣、动物骨骼等。第⑧层为深黄褐色黏土夹杂灰黑

色黏土,出土陶绳纹瓦片等。第⑨层为灰褐色黏土夹杂灰黑色黏土,出土夹砂黑陶、红陶和泥质黑陶、灰陶片,以及陶绳纹瓦片、砖块、炼渣等,还有少量树皮、木片、铜箭镞、残铜器和残铁器。第⑩层为灰黑色黏土,较疏松,夹杂较多炭屑,出土泥质黑陶片、陶绳纹瓦片、动物骨骼及少量碎铜渣、炼渣等,还有少量树皮、木片及铜钱、铜箭镞。第⑪层为黄褐色膏泥夹杂灰白色、红色膏泥,出土少量陶绳纹瓦片。第⑫层为灰褐色黏土夹杂深褐色黏土,出土陶绳纹瓦片以及少量树皮、木片和残铁器。第⑬层为灰褐色黏土夹杂深红褐色黏土,较疏松,夹杂较多炭屑,出土陶绳纹瓦片、砖块以及大量树皮、木片。第⑭层为黄褐色膏泥夹杂灰白色膏泥,出土陶绳纹瓦片以及树皮、木片,木片腐朽严重,部分疑似木筒残片。第⑮层为灰白色膏泥夹杂黄褐色、灰黑色膏泥,含较多炭屑和白色砾石,出土少量陶绳纹瓦片以及木筒残片和木器残块(图一三)。

### (三) 城门

在城址第Ⅲ地点约位于西城墙中间位置,发现西城门并对其进行了揭露。从已发掘情况看,城门至少可分早、晚两期,均为单门道过梁式,但形制和结构有所变化。另外于城门内侧发现建筑23F1,推测为门楼,与早期城门对应,至晚期被废弃(见图六;图一四)。

1.早期城门 门道宽4.85、进深5米,两侧城墙残高0.45—0.63米。门道地面为厚0.02—0.04米的黏土,多呈灰黑色,局部泛黄,表面较平整,未见车辙等痕迹,与城门内侧建筑23F1地面大致连为一体。门道中部有一处南北向的



图一三 22ⅢTG1内西城壕(XHG1)平、剖面图

- ①.黑色砂质黏土 ②.青灰色砂质黏土 ③.灰白色膏泥夹杂黄褐、红褐色膏泥  
⑤.灰白色膏泥夹杂黄褐、红色膏泥 ⑥.黄褐色黏土夹杂红色、灰色黏土及灰白色膏泥  
⑦.黄褐色黏土夹杂红色、灰色黏土 ⑧.深黄褐色黏土夹杂灰黑色黏土  
⑨.灰褐色黏土夹杂灰黑色黏土 ⑩.灰黑色黏土 ⑪.黄褐色膏泥夹杂灰白色、红色膏泥  
⑫.灰褐色黏土夹杂深褐色黏土 ⑬.灰褐色黏土夹杂深红褐色黏土 ⑮.灰白色膏泥夹杂黄褐色、灰黑色膏泥



图一四 西城门主要遗迹(西北→东南)



图一五 西城门北侧砖基、壁砖及残留木地袱痕迹(西南→东北)

沟状遗迹，最宽约0.5、局部解剖深0.18米，有可能为门限或门槛所在位置，晚期被破坏。门道南北两侧为砖砌基础，残长约4.6、宽0.4—0.45、高0.14—0.2米，为上下两层错缝叠砌，砖缝及砖基与夯土城墙之间使用膏泥粘接。用砖多为灰色长方形，侧面饰菱形等几何纹。南侧砖基顶部靠门道一侧有一条红色颜料条带，宽0.07米。北侧砖基内侧又立一排砖，贴于城墙壁上，砖基上残存炭化的木痕，推测原有木地袱（图一五）。门道两侧砖基及木地袱与门内建筑23F1中间的两列礅墩对应，基本在一条直线上，且门道与23F1现存地面连为一体，土质也接近，故

推测23F1为早期城门的门楼建筑。

23F1位于西城门内侧，紧邻城墙及门道。发现的遗迹有礅墩、础石、散水等，现存地面与城门门道齐平，为黑褐色较致密土。礅墩呈东西两排、南北四列分布，共8个，构成一处南北向的长方形三开间建筑，其中当心间正对西城门门道。面阔方向和进深方向的柱心距

均约5.5米。除东北角礮墩(SD8)稍小且平面近圆形外,其余礮墩平面均大致呈圆角方形,尺寸亦相近,边长1.6—2米。礮墩由夹杂膏泥的黄褐色土与石块、砖块等夯筑而成,从部分被打破的剖面看,深0.55—0.65米。西北角礮墩(SD4)表面发现一础石,平面近圆形,直径0.55—0.6米,嵌于礮墩之中。散水位于基址东侧,大致沿东边一排礮墩分布,南北长17.6米,中部被一大的现代坑打破,南、北两端呈直角向东拐弯,又分别延伸出发掘区并被晚期遗迹打破。散水主要用陶绳纹瓦片平铺而成,下有弧底浅基槽,现存表面宽度不一,主体部分宽1—2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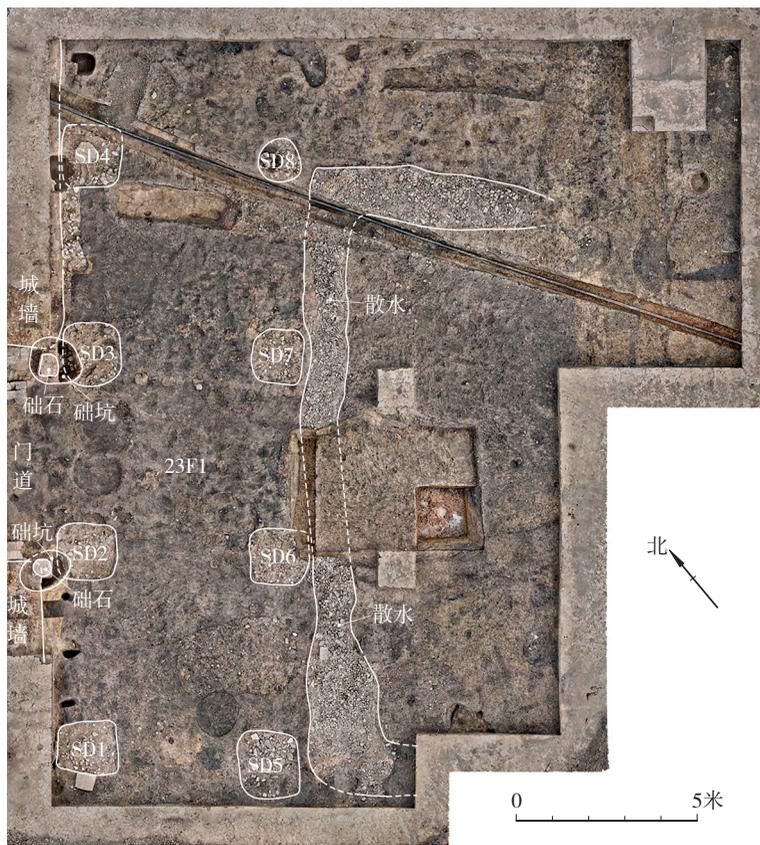
23F1西边一排礮墩紧靠城墙,不排除该门楼建筑的顶部向外侧延伸并覆盖

城墙及门道的可能。换言之,门道内侧的三开间建筑只是门楼靠内的一半,另一半则位于城墙和门道之上,可能于城墙之上还立有一排矮柱。另外,从散水的分布和走向看,早期城门在使用时,从门道入城后,可能并无道路向前延伸,而是在门楼内向左、右两边转向,从门楼南北两侧及相关通道进城。因散水向东转向,推测门楼两侧可能还有其他建筑(见图六;图一六)。

2.晚期城门 门道大小基本未变,但两侧砖基废弃不用,于门道口和外墙口处两侧分别立柱,柱下有础坑,础坑打破城墙拐角、早期门道两侧砖基以及23F1礮墩。4个础坑彼此对称,口近椭圆形或长方形,坑内填土中包含大量陶绳纹瓦片。发掘时,除门道外口南侧

础石缺失外,其余础坑顶部均保留础石。础石平面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直径0.44—0.73、厚0.13—0.15米,表面较平整,有篆刻等修整痕迹。从柱础及础坑排列看,晚期城门可能略南移。另外,晚期地面也有所抬高,铺垫含较多陶绳纹瓦片的杂土,厚约0.18米。晚期城门内侧早期的门楼建筑也已废弃,23F1礮墩及地面被垫土覆盖,正对城门的门面铺垫较多陶绳纹瓦片,推测作为道路使用。

晚期门道西端即外口处,于两侧各发现一块石门砧,南北对称。石门



图一六 23F1正射影像



图一七 西城门外口南侧石门砧（东北→西南）

砧与础石共用础坑。均为灰色泛黄砂岩制成，近方形，正面内侧凿有两个圆形白孔，外侧凿一长条形横槽，横槽靠外端有一梯状内收结构。南侧石门砧（23XCM：1）正面长0.73、宽0.65米，厚0.24米，白孔口径0.14、深0.09米，横槽长0.55、宽0.12、深0.1米（图一七）。该石门砧为一残碑改制而成，具体情况详见下文。北侧石门砧表面及侧面均有篆刻修整痕迹，正面长0.69、宽0.64、厚0.2米，白孔口径0.14、深0.08米，横槽长0.51、宽0.12、深0.09米。在南北两个石门砧中间还发现有形状不甚规则的石块，其中两块竖埋于地面，应为门限石和将军石。

#### （四）城内壕沟

发现1处，编号23G3。位于城址北部第Ⅴ地点，发掘部分呈东北—西南向，叠压于探方第7层下，打破第8层和生土，被23J2等遗迹打破。23G3南北两端及西部延伸出发掘区，故仅对其局部进行了清理，具体走向及范围待今后发掘再予探明。发掘部分南北长约14、口部东西宽3.6—4.3、底部东西宽2.6、深3.1米。东侧沟壁较斜直，靠近北端处沟壁尤为平滑，似经人工处理过。沟内堆积可分为5层，土质多较致密，一般沿沟东壁呈东高西低坡状堆积。第1层为黄褐

色膏泥夹杂白膏泥，出土陶绳纹瓦片、灰陶片等。第2层为黑灰色淤泥夹杂白色膏泥，质地较疏松，夹杂较多炭屑，出土陶绳纹瓦片、铜印章、铜钱树残件、漆器残片等。第3层为黄褐色膏泥夹杂粗砂砾及少量灰膏泥，出土陶绳纹瓦片。第4层为黑灰色淤泥，质地疏松，夹杂炭屑，包含较多木块。第5层为黄褐色膏泥夹杂白色、灰色膏泥，包含物极少（见图九、图一〇）。

#### （五）建筑基址

除西城门门楼建筑23F1外，在城址西南部即第Ⅱ地点也发现多组磔墩，其中靠西边的一组排列较为有序，应属同一建筑，编号23F2。

23F2 位于城内西南角，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清理部分按磔墩边缘测量，东西长11.1、南北残宽6.3米，西侧距西城墙、南侧距南城墙均约6.5米。现存地面较为平整，为黑褐色土，土质较致密。发现磔墩30个，呈南北四排、东西九列分布，其中南侧一排仅清理靠东边的3个，其余位于发掘区外。磔墩排列密集，南北向间距1.7—1.8、东西向间距1.2—1.35米。磔墩平面近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尺寸较23F1的明显偏小，南北长0.89—1.21、东西宽0.75—1.03米。从部分被晚期遗迹打破的剖面看，磔墩一般深0.5米左右，内填夹杂膏泥的黄褐色土，以及石块、砖块和陶绳纹瓦片等，有些顶部砖块特意摆放较为平整（见图四；图一八）。从平面形制及磔墩排列等情况看，23F2很可能为仓储类建筑，结构类似于干栏式房屋。建造方式为在磔墩之上通过密集立矮柱，再平铺木板，以起到通风防潮等作用。汉长安城

武库第七号建筑<sup>[2]</sup>、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58C93F01<sup>[3]</sup>等大型建筑的基础，亦采用与此相似的密集础石结构。

23F2东侧亦清理出若干磔墩，东北侧还发现一些内填石块、砖块和陶绳纹瓦片等的沟状遗迹，它们与23F2的关系尚待进一步发掘后确认（见图四）。

### （六）水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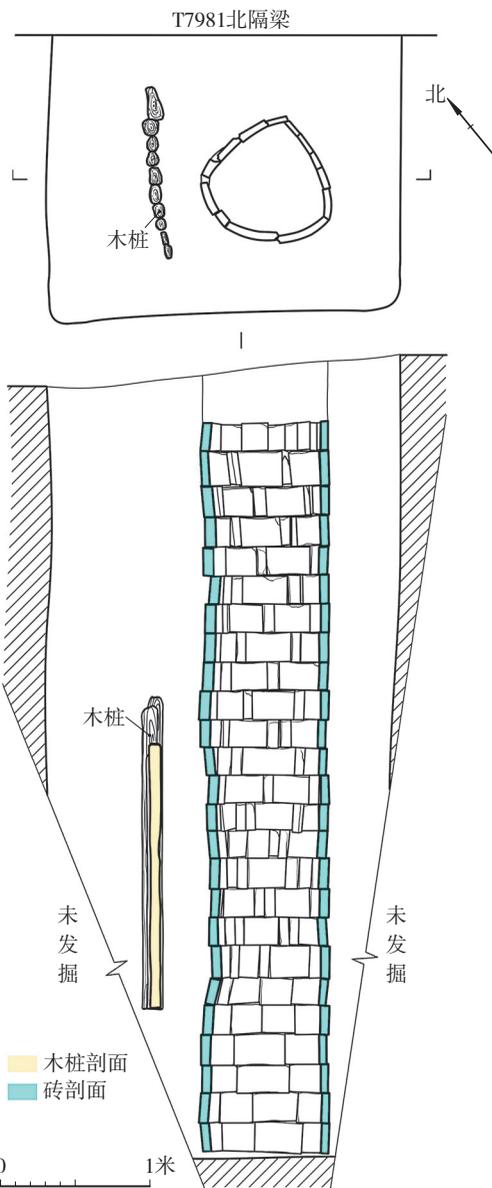
共2座，编号为23J1、23J2。均位于城址北部即第V地点，其中23J1可能为明清以后遗迹，且井口较小，未向下清理。

23J2 位于T7981东北部，叠压于探方第6层下，打破第7层、23G3及生土（见图九）。井坑北侧延伸进探方北隔梁，发掘部分平面近方形，直壁，平底。口部东西长2.32、南北宽1.84米。井坑内填夹杂青膏泥的灰黑色土。砖砌井圈，平面近圆形，直径约0.8、深4.75米。井圈最上层用弧形砖围砌，砖两端有榫卯结构互相咬合。第2层开始用长方形砖、梯形砖横立逐层垒砌，每两块横立长方形砖转角之间由外侧垂直插入一长方形砖或梯形砖。接近井底处数层，再次采用弧形砖围砌。可能由于井坑西侧打破23G3，土质较松散，故在修筑23J2的过程中于靠近井坑下部的井圈西侧打入



图一八 23F2（西南→东北）

一排木桩，以支撑井壁。木桩长1.8—2.1米，横截面多近六边形，直径0.09—0.12米，个别为板状（图一九；图二〇）。



图一九 23J2平面、剖视图



图二〇 23J2砖砌井壁（西南→东北）

井圈内填土上部为灰黑色砂土，下部为灰黑色淤泥。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陶绳纹瓦片、瓦当以及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编器、铜钱等。

### 三、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种类较多，主要有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骨器、竹编器、玻璃制品、琥珀制品、铜钱、木筒等。

#### (一) 建筑材料

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砖、石门砧等。

板瓦 数量多，但完整或可修复者少。多为夹砂灰陶，部分为夹砂黄褐陶。凸面均饰绳纹，凹面大多有布纹，少数饰绳纹。瓦侧一般可见由内向外切割痕迹。从完整器看，瓦窄端凸面有抹光带，部分于中部涂抹形成横向抹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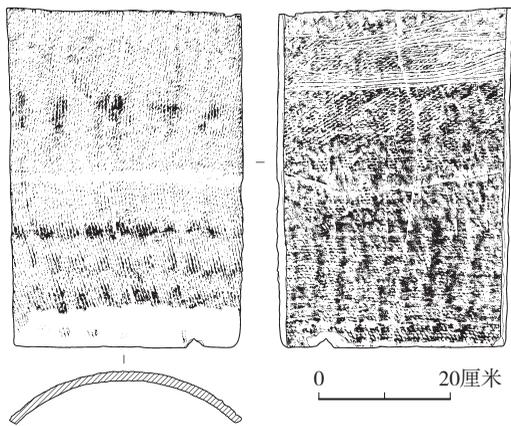
23G3④：5，凸面饰粗绳纹，可见多道横向抹痕，窄端有宽约6厘米的抹光带。凹面残留大量绳纹，有大量水平状抹痕，宽端附近有多道横向细条状压痕。长50.9、宽端弦长37.8、窄端弦长34.5、拱高7.9、厚0.9—1.1厘米（图二一）。

23J2：2，凸面饰粗绳纹，凹面

饰布纹。凸面窄端有宽约3.6厘米的抹光带，近窄端处有一涂抹而成的“五”字形图案，中部有三道抹痕。残长36.9、残宽27.5、厚1.3—1.7厘米（图二二）。

筒瓦 数量多，但完整或可修复者少。多为夹砂灰陶。瓦侧缘处多变薄，一般不见切割痕迹。凸面饰绳纹，绳纹粗细不一，凹面有布纹，部分凸面中部或后端有横向抹痕。23J2：18，凸面饰粗绳纹，中部有一道抹痕。长47.5、弦长13.9、拱高8.2、厚0.6—0.9厘米（图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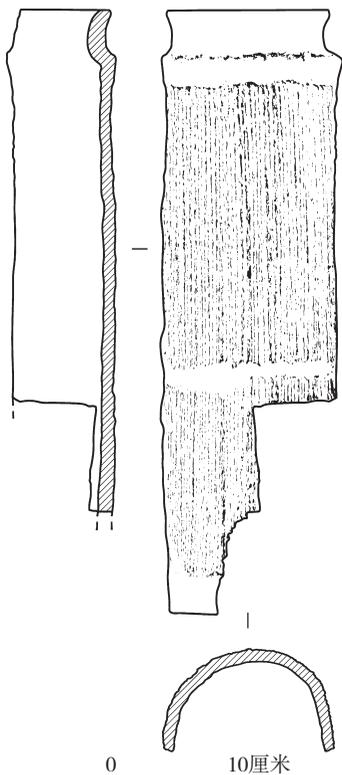
瓦当 80余件，其中可辨纹饰者41件。多为灰陶，个别为红褐陶。当面均呈圆形，观察部分残件的制作痕迹可知，瓦当成型后先切掉边轮的上半部，随后套接筒瓦，套接后于瓦当边轮与背面敷泥进行加固。根据当面装饰分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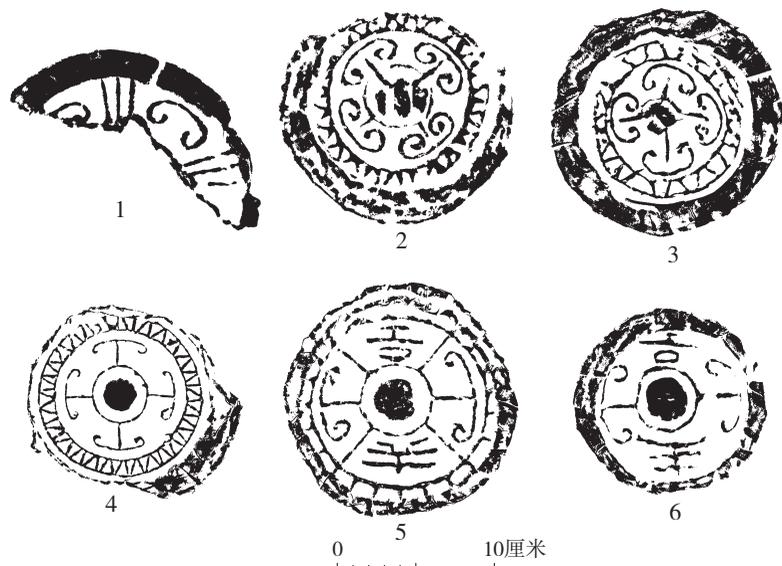
图二一 出土陶板瓦（23G3④：5）



图二二 出土陶板瓦（23J2：2）拓本



图二三 出土陶筒瓦（23J2：18）



图二四 出土陶瓦当拓本

1.A型云纹瓦当(22ⅡTG1②:1) 2、3.B型云纹瓦当(22ⅢXHGI③:1、T8082④:4) 4.C型云纹瓦当(T7981⑤:1) 5、6.文字瓦当(23WD1:2、23F1散水:6)

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两类，存在同范瓦当。

云纹瓦当 19件。根据纹样不同，分为三型。

A型：1件(22ⅡTG1②:1)。当心及下部残。三界格四分当面，界格间饰卷云纹。边轮外沿有抹泥修整痕迹，当背可见套接筒瓦后的敷泥和抹痕。当



图二五 B型陶云纹瓦当(22ⅢXHGI③:1)

面复原直径16、边轮宽1.4—1.6、当厚2厘米(图二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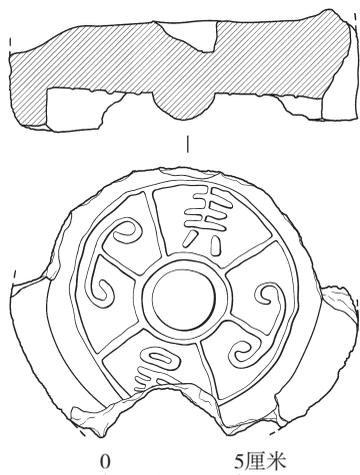
B型：16件。当心圆乳丁上有一动物形象，自当心延伸出4条直线将当面四等分，每条直线分别指向卷云纹，外围饰锯齿纹。当背有套接筒瓦后的敷泥和抹痕，中心有手指按捺的深窝，深窝与正面当心圆乳丁对应。

22ⅢXHGI③:1，上半部边轮脱落，脱落处可见套接筒瓦时留下的筒

瓦背面布纹痕迹。当面直径14.4、边轮宽1.7—2、当厚1.9厘米(图二四,2;图二五)。T8082④:4，表面有一层黑色陶衣。当面直径14.4、边轮宽1.8、当厚1.7厘米(图二四,3)。

C型：2件。当心为大乳丁。T7981⑤:1，当心乳丁外围绕一圈凸弦纹，由当心延伸出的直线四分当面，直线前端接卷云纹，外围饰锯齿纹。当面残径13.8、边轮宽1.5—1.6、当厚1.2厘米(图二四,4)。

文字瓦当 22件。当心为一大乳丁，当面左右饰卷云纹，上下为“吉”“羊”二字。当背与筒瓦套接处有敷泥和抹痕，中心有手指按捺的深窝，深窝与当面圆乳丁对应。23WD1:2，单界格不穿当心，四分当面，外围饰一周凸弦纹和放射状短线纹。当面直径15、边轮宽1.1、当厚1.3厘米(图二四,5)。23F1散水:6，无四分格界。边轮内侧



图二六 出土陶文字瓦当  
(T7981⑥:1)

有明显二次修补痕迹。当面残径12.2、边轮宽0.9—1.4、当厚1.08厘米（图二四，6）。T7981⑥:1，单界格不穿当心，四分当面，当面外围有一周凸弦纹。上半部边轮脱落，脱落处可见套接筒瓦时留下的筒瓦背面布纹痕迹，以及明显的当背敷泥层。瓦当与筒瓦套接时方向放反，导致“吉”字在下，“羊”字在上。当面径12.6、边轮宽1.2—1.5、当厚2.3厘米（图二六；图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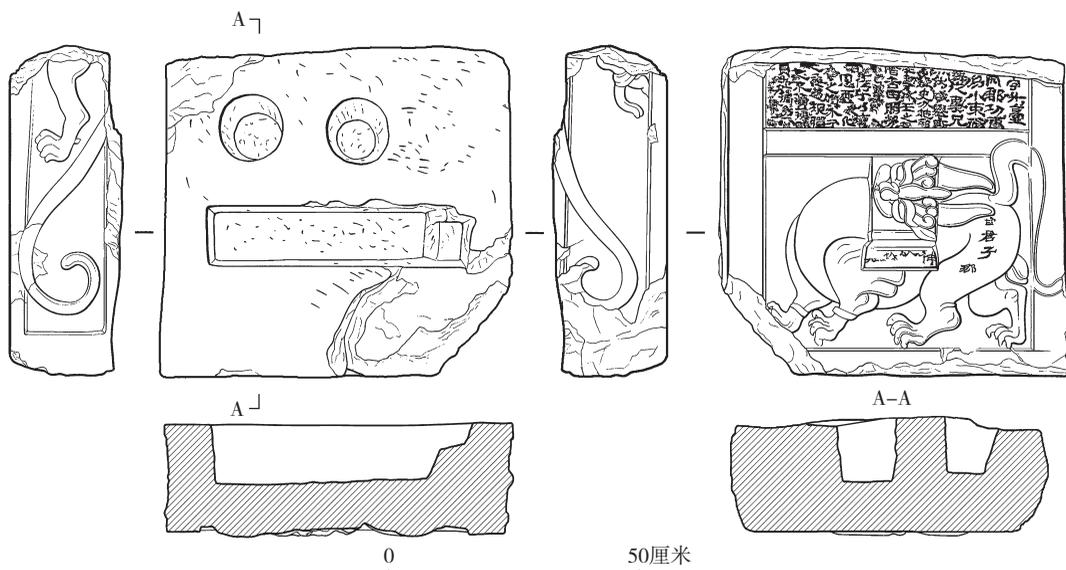
砖 多夹砂，以灰陶为主，另有部



图二七 陶文字瓦当 (T7981⑥:1)

分黄褐陶。按形制主要分为长方形砖、梯形砖、弧形砖，长方形砖数量多，后两者较少。长方形砖和梯形砖多于一侧饰菱形等几何纹，与汉晋时期墓砖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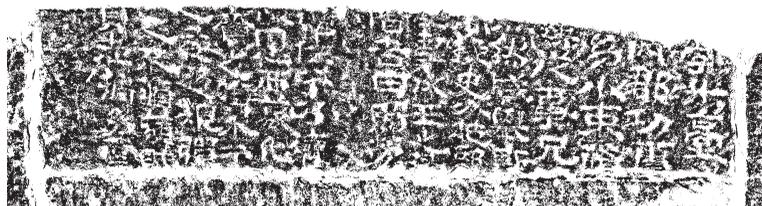
石门砧 2件。发现于西城门晚期阶段外口处南北两侧，材质、形制、大小等相近（详见上文）。其中南侧石门砧（23XCM:1）由一残碑改制而成<sup>[4]</sup>，背面尚存部分碑文及动物浮雕装饰（图二八；图二九）。该碑残存下部，底面中间位置尚隐约可见断榫痕迹。残存



图二八 石门砧 (23XCM:1)



图二九 石门砧(23XCM:1)背面碑刻  
碑阳左、右两边及底边带边框,左、右边框宽7—8、底部边框残宽6厘米。残存碑阳上部于边框内阴刻碑文,下部于边框内饰浮雕,两区之间以一宽6厘米的界格相隔。碑文区残留60余字,为汉隶风格,自右向左竖读,共14行,其中第八和第九行之间有明显空行。字多漫漶不清,经初步辨识,右侧8行分别为“□字升台”“□内郡功曹”“□幼小束修”“□□从事兄”“□□然咸举斯”、“□少□史分施卹”“□□□□王之□”“□□吉日赐劳”;左侧6行分别为“□□兮乃遭”“□以恩西哀化”“□齐之□不兮”“□□安之规弹”“□之不痛薄师”“□负老携幼□”(图三〇)。大致来看,右侧8行为碑主生平事迹,左侧6行为颂铭。碑文区下边的浮雕为一神兽衔碑图案。神兽头生两角,身有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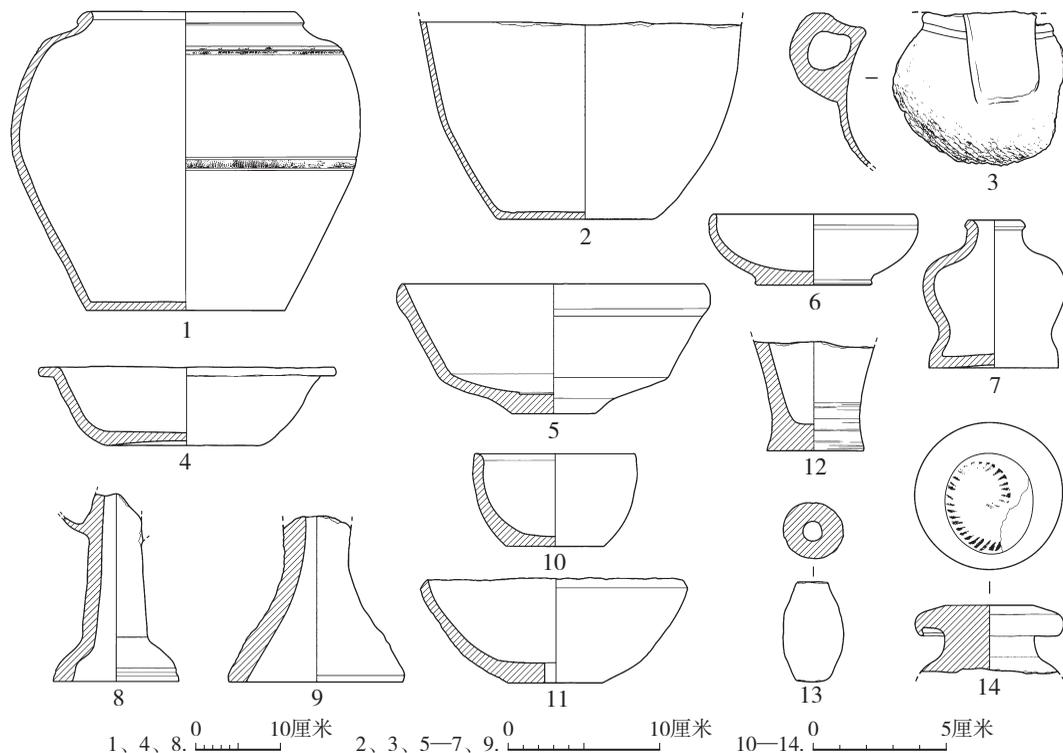
图三〇 石门砧(23XCM:1)背面碑文拓本

的翼,前腿带脚环,臀后可见雄性生殖器,长尾上扬后又下垂,尾端卷曲,部分延伸至右侧边框上,改为阴线刻制。从造型看,该神兽可能为辟邪。神兽臀部及其口中所衔碑的基座处亦可见阴刻文字:臀部有竖行“□君子”等字,左下侧另见一“郡”字;碑基座处为横行文字,约有4字,仅可辨最右边的“神”字。这几个字与上边碑文区的字在书体上似略有不同,或出自不同人之手。碑身两侧亦有动物浮雕,均仅见后足和尾部,长尾,后端上卷,左侧似龙,右侧似虎。

### (二) 陶器

陶片数量较多,可复原者少。夹砂陶占绝大多数,陶色主要包括褐、黄、红、灰、白五类,黄陶与白陶内外壁多因渗炭呈现深灰色。部分罐、盆器表因轮修多见水平状线痕,也见因磨光工艺形成的水平条带状亮痕。可辨器形主要有釜、甑、罐、盆、钵、盏、瓶、灯、器盖、纺轮、网坠、陶饼、陶丸、陶模等。既有汉式陶器,也有本地风格陶器。

罐 残片较多,可复原者少。T5067③:1,泥质白陶,双面渗炭。敛口,圆唇,微折肩,腹部圆鼓,下腹斜内收,大平底。肩部与腹中部饰直棱纹。口径23.1、底径23.2、高34.9厘米(图三一,1)。22H11⑥:4,夹砂黄褐陶,外壁颜色斑驳,局部有烟炱痕迹。仅存下半部分,器壁较薄,鼓腹,平底。残腹径18.8、底径9.5、残高12.1厘米(图三一,2)。



图三一 出土陶器

1、2.罐 (T5067③: 1、22H11⑥: 4) 3.釜 (22NHG2⑭: 2) 4.盆 (22H13②: 2) 5、6.钵 (22ⅡTG1③: 5、23G3④: 7) 7.瓶 (23J2: 11) 8、9.灯 (23J2: 4、23G3①: 8) 10、11.盏 (T8182④: 3、22H17: 1) 12.小平底器 (22G4ZL6: 8) 13.网坠 (23F2SD19: 1) 14.器盖 (T8181④: 4)

釜 数量较多，大多仅存口沿。22NHG2⑭: 2，夹砂白陶。外壁残存大面积烟炆痕。仅存部分口沿和腹部，宽折沿，沿面接一桥形耳至肩部，鼓腹。肩下区域装饰粗绳纹。复原口径9.8、残高9.9厘米（图三一，3）。

盆 数量极少。22H13②: 2，夹砂及蚌壳红陶。外壁多见烟炆痕。敞口，宽平沿，方唇，斜腹，大平底。素面。口径34、底径17.8、高8.8厘米（图三一，4）。

钵 数量较多，多数仅残存器底。常见夹砂灰陶、白陶或黄陶，白陶与黄陶的内外壁多因渗炭呈灰黑色。部分陶钵内底中部戳印有一方格及四瓣花叶纹。多为饼足底，偶见圈足。

22ⅡTG1③: 5，夹细砂灰陶，外壁偏灰黑色。敞口，圆唇，折腹，小平底，内底凹陷。素面。口径17.5、底径5.7、高6.1厘米（图三一，5）。23G3④: 7，夹细砂灰陶。口微敛，尖唇，微鼓腹，饼足底。口沿处饰一周凹弦纹，内侧底部有轮制痕迹。口径12.7、底径7.8、高4.7厘米（图三一，6）。23H7: 1，内底部戳印有填充斜线的方框，内为花叶纹。戳印方框边长2、足径7.2厘米（图三二）。T8182④: 9，戳印方框边长2.1、足径9.6厘米。23G1: 2，戳印方框边长2.1、足径9.4厘米。

瓶 1件（23J2: 11）。泥质灰陶，内外壁因渗炭呈深灰色。器表有轮修痕迹，底部有线切割痕。小口，斜



图三二 陶钵内底的戳印纹(23H7:1)

唇,短颈,鼓肩,下腹内收,平底略内凹。口径3.9、底径8.5、高9.5厘米(图三一,7)。

灯 2件。均为豆形灯,仅存灯柱和灯足。23J2:4,泥质灰陶。浅盘中央为灯柱,呈空心圆柱状,下为喇叭形足。足径14、残高20.4厘米(图三一,8)。23G3①:8,夹砂灰陶,胎心红褐色。喇叭形足,上承空心柱。素面。残足径11.4、残高10.2厘米(图三一,9)。

盏 数量较少。T8182④:3,泥质灰陶。直口,尖圆唇,腹微鼓,平底。复原口径7、底径4.4、高3厘米(图三一,10)。22H17:1,夹砂黄陶,器表斑驳,局部泛黑。敞口,尖唇,斜腹,平底,底部中心有一圆穿。素面。口径10.1、底径4.8、高3.9、底部穿孔直径0.9厘米(图三一,11)。

器盖 1件(T8181④:4)。夹砂黄陶,双面渗炭,外壁呈深灰色。仅存盖钮,钮呈扁圆形,正面微弧,边缘下卷,钮柄较矮,内束。钮面压印有螺旋状倒三角纹。钮部残径5.8、盖残高1.8厘米(图三一,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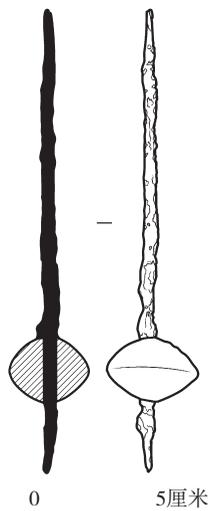
小平底器 数量较少。夹砂黑

陶、红褐陶或黄陶,个别为夹砂白陶,器表颜色多较斑驳。均残,从器形看应为本地区先秦时期常见的小平底瓶。22G4ZL6:8,夹砂黑陶,外壁局部泛红,仅残存底部及下腹部分区域。靠近器底处外壁可见数道凹弦纹。底径4、残高4.1厘米(图三一,12)。

网坠 7件。多见夹砂灰陶或黑陶,部分为泥质陶。多呈梭形,粗细不一,中间有纵向圆穿。23F2SD19:1,夹砂灰陶。长3.4、最大径2.1、孔径0.6厘米(图三一,13)。

纺轮 4件。泥质灰陶。扁圆形,中间有圆穿。23J2:9,素面。出土时纺轮的圆穿中留有铁轴,铁轴横截面为方形,两端渐细呈锥状。纺轮直径3.2、孔径约0.5、高2.1厘米,铁轴长18.2厘米(图三三)。

陶模 40余件。多数残,主要出土于第Ⅳ、第Ⅴ地点。夹砂红陶。形制、大小相近。从完整器看,整体为长方棱台形,顶面中部下凹,底面平,顶面稍小于底面,侧面与端面以及侧面、端面与顶面交汇处呈圆角形。两侧面各有两道竖向浅槽,两端端面亦有相似凹槽,但其中一端有一道,另一端有两道。部分陶模与炼渣等冶炼产物共出,推测与金属冶铸有关,可能用于翻砂铸造金属锭。22DCQ1⑥:1,一角残。顶面长9.6、宽5.1



图三三 出土带铁轴陶纺轮(23J2:9)



图三四 陶模 (22DCQ1⑥ : 1)

宽6.2厘米，高3.7厘米；侧面和端面竖向凹槽宽约0.5、深约0.1厘米（图三四）。

### （三）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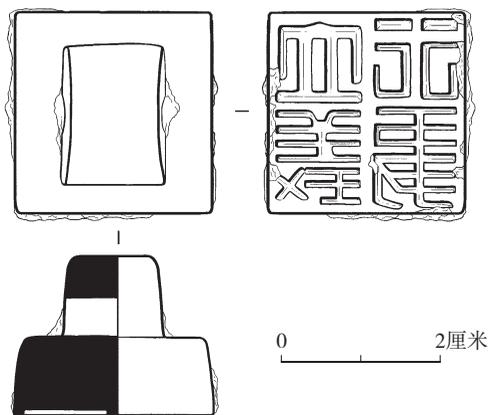
数量较少，主要有箭镞、悬刀、盞、镜、笄、印章、铃、泡钉、钱树残片等。

印章 1枚 (23G3② : 32)。方形印台，瓦钮，圆形钮孔较小。印文为白文篆书“立义行事”四字，从左至右、从上至下顺读。印台边长2.5、通高1.98厘米（图三五）。

箭镞 分管盞镞和有铤镞两类。

管盞镞 可辨器形者约10件。镞身为三翼式，前锋尖锐，翼尾如倒刺，圆盞，盞外壁略带棱角。T4867③ : 1，残长4.2、盞口直径0.6厘米（图三六，1）。T4968③ : 1，盞略残。残长5.4、盞口残径0.9厘米（图三六，2）。

有铤镞 可辨器形者约20件。镞身多呈三棱锥形，个别呈扁四棱锥形，关多呈六边形，少数为圆形，有圆铤、椭圆铤和棱柱状铤三种。23G3② : 24，扁四棱锥形镞身，关为六边形，近棱柱状铤，铤尾残。残长6.3厘米（图三六，3）。T6465② : 2，三棱锥形镞身，关近六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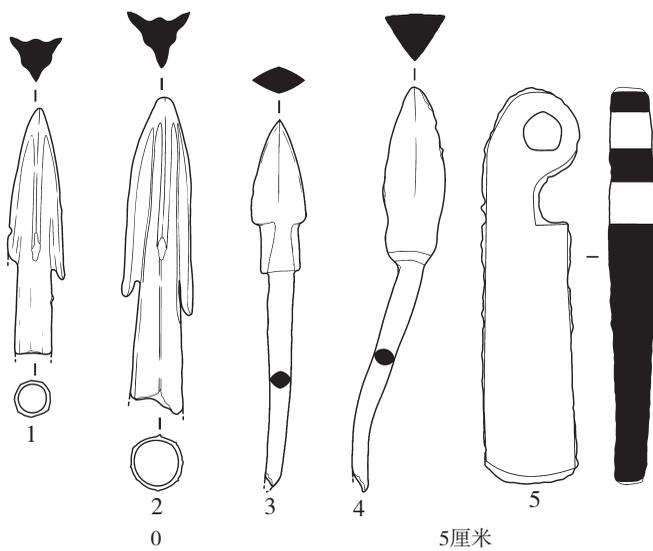
图三五 出土铜印章 (23G3② : 32)

形，椭圆铤，铤尾略残。残长7厘米（图三六，4）。

悬刀 1件 (23G3① : 1)。长条形，通体素面。长6.9、宽1.67、厚0.55—0.77厘米（图三六，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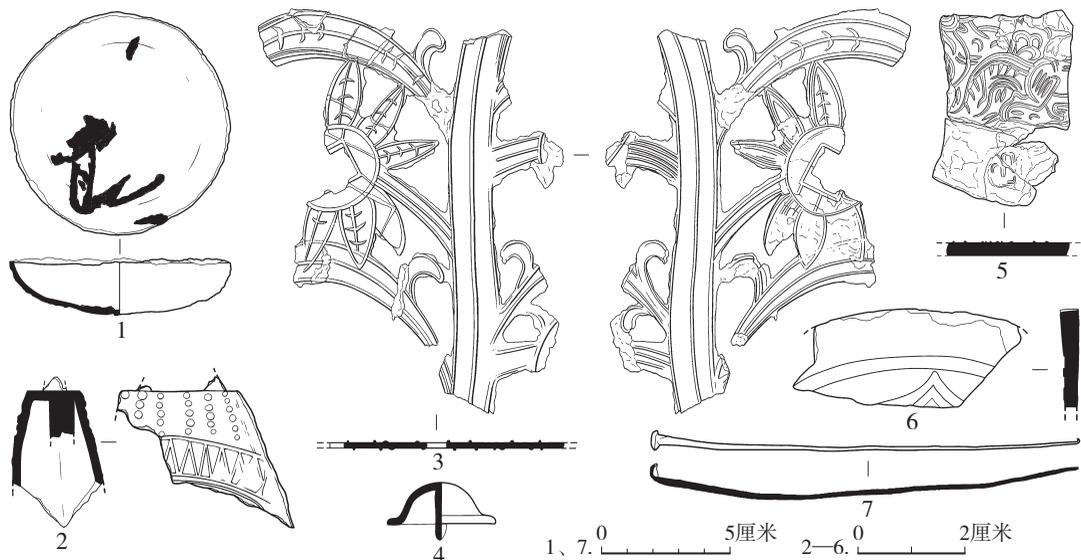
盞 1件 (22H13③ : 1)。圆底。表面锈蚀严重，出土时盞内残留黑色炭化物质。口径8.3、高2.2厘米（图三七，1）。

镜 2件。残。22G12① : 2，仅存镜子中部一小块残片。镜背可见动物纹饰，右侧似虎身后部及虎尾。残片



图三六 出土铜器

1、2.管盞镞 (T4867③ : 1、T4968③ : 1) 3、4.有铤镞 (23G3② : 24、T6465② : 2) 5.悬刀 (23G3① : 1)



图三七 出土铜器

1.盃(22H13③:1) 2.铃(23G3②:44) 3.钱树残片(23G3②:34) 4.泡钉(22IVTG1③:1) 5、6.镜(22G12①:2、22IVTG1③:4) 7.笄(23J2:8)

长3.7、宽2.6、厚0.29厘米(图三七, 5)。22IVTG1③:4, 残存小块镜缘。素缘, 缘内为内向连弧纹。残片长4.4、宽1.85厘米, 镜缘处厚0.38、连弧纹处厚0.23厘米(图三七, 6)。

铃 1件(23G3②:44)。已残。铃身扁宽, 口内凹, 顶部钮残, 仅存根部, 腔内悬一舌, 已锈蚀残断。铃身上部饰竖列乳丁, 下部饰弦纹和栉齿纹。口部长轴2.5、短轴1.15厘米, 铃残高2.7厘米(图三七, 2)。

泡钉 4件。多残。22IVTG1③:1, 圆帽形, 有沿, 外壁光滑, 内壁可见竖向铸缝, 钉呈方锥形。圆泡口沿直径2.05、钉长0.9厘米(图三七, 4)。

笄 1件(23J2:8)。圆条状, 一端较粗呈勺形, 一端尖细, 略呈弯钩状。出土时泛黄铜光泽, 后因氧化, 颜色渐泛白。长16.2、直径0.1—0.3、勺宽约0.7厘米(图三七, 7)。

钱树残片 5件。均残。23G3②:

34, 残存枝叶和莲花, 莲花作盛开状, 花蕊为方孔圆钱形。残长7.7、残宽5.8、厚0.02厘米(图三七, 3)。

#### (四) 铜钱

共60余枚。多残或锈蚀严重, 可辨钱文者大多为五铢, 另有少量大泉五十、货泉和布泉。

五铢 25枚。23G3②:25, 有周郭和背穿郭, 周郭较窄, 钱文“五”字交股弯曲, “铢”字“金”头呈三角形, “朱”字头较圆润。钱径2.63、穿宽0.92、周郭厚0.02厘米。T7982⑤:6, 有周郭和背穿郭, 钱文“五”字交股较弯曲, 左侧笔画较粗, “铢”字“金”头较小, 形似箭簇, “朱”字头略显方折。钱径2.49、穿宽0.91、周郭厚0.16厘米(图三八, 1)。23G3②:17, 两枚五铢钱粘叠在一起, 均有周郭和背穿郭。23G3②:17-1位于上部, 周郭较窄, “五”字交笔缓曲, “铢”字锈蚀不可识。钱径2.56、穿宽0.93、周郭厚0.15厘



图三八 铜钱

1.五铢 (T7982⑤:6) 2.大泉五十 (T4768③:3)  
3.货泉 (22NHG2⑧:1) 4.布泉 (T7981③:1)

米; 23G3②:17-2位于下部,面穿上有一横,“五”字交笔斜直,上下两横略出头,“铢”字被叠压不可见。钱径2.53、穿宽0.91、周郭厚0.1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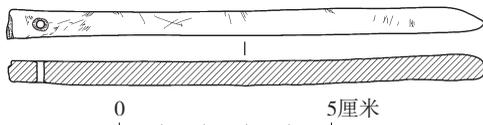
大泉五十 1枚 (T4768③:3)。正背面均有周郭和穿郭,“大泉”二字宽扁,“大”字上横左右向下弧曲,“五十”二字细长,“五”字交笔弯曲。钱径2.63、穿宽0.94、周郭厚0.21厘米 (图三八,2)。

货泉 2枚。22NHG2⑧:1,有周郭和背穿郭。钱径2.36、穿宽0.65、周郭厚0.18厘米 (图三八,3)。

布泉 1枚 (T7981③:1)。钱币正背面均有周郭和穿郭,形制较规整,钱文清晰,笔画粗壮圆润,“泉”字中竖贯通。钱径2.51、穿宽0.69、周郭厚0.22厘米 (图三八,4)。

#### (五) 骨器

筭 1件 (22H13②:4)。白色泛黄,器表光滑。长条状,横截面呈方形,头端打磨呈楔状,尾端略残,有



图三九 出土骨筭 (22H13②:4)

一对向钻圆穿,穿孔向内逐渐收缩。长11.2、宽0.55、尾端穿径0.2—0.3厘米 (图三九)。

#### (六) 竹编器

共3件。均残,出自23J2,出土时颜色鲜艳。23J2:14,器形不可辨,以宽竹篾为经,呈放射状编织,以细竹条为纬,逐圈穿插编织,边缘锁边。残长18.8、残宽11.6厘米 (图四〇)。

#### (七) 玻璃制品

玻璃珠 3件。均呈圆球形。22IV TG1:9,暗红色,带黑色瓜棱状竖条纹,中有一圆穿。直径0.51、高0.42、孔径0.18厘米 (图四一,1)。T8181④:7,蓝色半透明,表面风化,中有一圆穿。直径0.52、高0.41、孔径0.16厘米 (图四一,2)。23H14:1,深蓝



图四〇 23J2竹编器出土情况 (西南→东北)



图四一 玻璃珠

1.22IVTG1:9 2.T8181④:7 3.23H14:1



图四二 玻璃耳瑯  
(22IVTG1⑥:3)



图四三 琥珀珠  
(23G3②:18)



图四四 木简  
(22XHGI⑮:1)

色，半透明，表面风化，中有一圆穿。直径0.79、高0.61、孔径0.02厘米（图四一，3）。

玻璃耳瑯 1件（22IVTG1⑥:3）。蓝色，半透明。束腰状，两端粗细不同，粗端残，呈喇叭口状，边缘有平棱，细端亦向下呈弧形内凹；圆形瑯穿较细，上下略微倾斜。高2.4、腰中部直径0.9、穿径0.1—0.15厘米（图四二）。

#### （八）琥珀制品

琥珀珠 1件（23G3②:18）。暗红色，半透明。表面通过雕刻形成动物造型，器身中部偏一侧有一圆穿。残长1.77、宽1.2、残高1.06、穿径0.15厘米（图四三）。

#### （九）木简

共数十枚，均出土于西城门外壕沟（22XHGI）内。多为残片并朽烂，仅少量残存文字。22XHGI⑮:1，长条形，下端残，表面修治平整。可见

“前别有衣也”五字墨书。残长11.6、残宽1.65—1.9、厚0.24厘米（图四四）。

此外，还出土瓷器、铁器和漆木器等遗物。其中瓷器极少，偶见残片，多灰白胎，表面施泛灰青釉。铁器和漆木器数量也少，且多锈蚀残朽，有待进一步修复和辨识。

## 四、结 语

朱提故城遗址2022—2023年的发掘主要围绕遗址北部的城址开展。城址出土的汉式陶器多属东汉至蜀汉时期，如大口圆肩平底罐23ⅡT5067③:1，以及器底戳印花叶纹的陶钵，在滇东北和黔北地区的东汉崖墓中<sup>[5]</sup>多有发现，也见于四川成都等地的很多东汉和蜀汉时期墓葬及遗址中<sup>[6]</sup>。形制相近的长方棱台状陶模，在四川西昌东坪冶铸遗址中也有发现，年代约在新莽前后<sup>[7]</sup>。建筑材料方面，陶板瓦和筒瓦凸面均饰绳纹，凹面多见布纹，与内地东汉瓦形制和制法相近；瓦当从形制、纹饰看，虽有一定地方特色，但与内地联系仍很密切，特别是和洛阳及四川等地材料相比可知，其年代基本都在东汉和蜀汉前后，其中近边轮处饰锯齿纹的陶云纹瓦当应不早于东汉晚期，可能主要属蜀汉甚至更晚时期<sup>[8]</sup>。“吉羊”文字瓦当极少见于他处，但“吉羊”二字在昭通本地东汉砖铭<sup>[9]</sup>及铜器铭文中时有出现<sup>[10]</sup>。铜器方面，2件铜镜残片从形制和纹饰看，可能分别为四神镜或禽兽镜（22G12①:2），以及连弧夔凤纹或连弧变形四叶纹镜（22TG1③:4），前者主要流行于西汉

晚期至东汉早期，后者主要见于东汉晚期。“立义行事”铜印章在四川平昌也曾有过出土，同出的还有“别部司马”“军假司马”“军假侯印”等官印，推测其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遗物<sup>[11]</sup>。饰莲花图案的钱树，在西南地区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期<sup>[12]</sup>，相似的莲花枝叶形钱树曾见于四川西昌<sup>[13]</sup>、陕西汉中<sup>[14]</sup>的东汉中期墓葬中。一端为勺形的铜筭，在四川成都青白江区五勤村汉代遗址也有出土，所在地层属东汉末至蜀汉时期<sup>[15]</sup>。钱币方面，除大泉五十和货泉等新莽钱币外，五铢钱形制及钱文多具东汉特征，但所出一枚布泉从钱文笔画看明显为北周钱币。木简方面，其上字体颇近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sup>[16]</sup>。综上，就城址目前所出遗物而言，大多呈现出东汉至蜀汉时期的风格，少数可早至新莽前后，或晚至南北朝时期。

发掘显示，城址东、南、西三面城墙叠压或打破的下层黄土均为人工堆筑，内含少量陶片、动物骨骼。东城墙基槽内出有陶模、铜渣等遗物；北城墙基槽直接打破更早的汉代地层或建筑基址；部分城墙夯土内也偶见陶片和陶绳纹瓦片。因此可判断，筑城之前此地为一处汉代聚落，聚落形成年代或可至新莽前后。从地层关系以及出土遗物特别是城门等建筑所用废旧汉砖等建筑材料看，城墙的最初筑造应不早于东汉晚期，后来经修补并长期沿用。西城门早期阶段、城址西南部的仓储类建筑(23F2)以及城址北部的壕沟(23G3)等，年代可能主要对应东汉晚期和蜀汉时期；西城门晚期阶段估计已进入晋甚至更晚时期，城址北部发掘的23J2年代也应不早于蜀

汉。个别北周钱币的出土，表明到了南北朝时期城址内还有人活动。不过，发掘几乎未见光面瓦等更晚的建筑材料，瓷器也出土极少，故推测晋以后城址虽还在使用，但已渐趋衰落，不再有大规模的建设，人口也不及此前。城址北部还发现疑似明清以后的水井等遗存，且当地村民称数十年前城址四周尚有一些明显高出地面的土埂(城墙)，说明很晚时期城址范围内或附近仍有人居住。总的来看，按现有调查和发掘所获，朱提故城遗址的年代主要在汉晋时期，大约于东汉晚期开始修筑城墙，城址兴盛阶段大致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

此次发掘确定了城址的四边城墙和部分城壕的位置，并揭示了城墙特别是其基础部分的筑造方式以及城壕的结构。此外，完整揭露了西城门并大致弄清了其形制及早晚变化，同时于城内清理出仓储类建筑及沟壕、水井等遗迹，由此对城址的选址、建造、形制、布局以及沿革等有了较深入的认识。目前重点发掘的城址应是整个朱提故城遗址的核心区域，其规模较同时期内地郡县治城要小得多，但在其外围约60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还埋藏着大量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砖瓦建筑以及制铁等手工业遗存，可知当时的聚落规模不小，而城址很可能只是重要官署所在。据文献记载，西汉武帝时设朱提县，东汉中期以后为犍为属国都尉治所，东汉末年置朱提郡并延续至南北朝时期<sup>[17]</sup>。就此次发掘的城址而言，其年代尤其是兴盛阶段似不能涵盖上述时间跨度，这是由于不同时期治所位置发生转移，还是因为治所形态有变化，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汉晋时期的朱提资源丰富，又邻近巴蜀地区，且处在重要交通线上，故经济文化非常发达。东汉时，当地所产铜洗等金属制品曾远销四方，流通甚广<sup>[18]</sup>。朱提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将为认识汉晋时期的朱提乃至滇、黔、川三省交汇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同时，此项工作的持续推进，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管辖和治理、考察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在云贵高原一带的兴衰等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参加朱提故城遗址2022、2023年发掘的人员有杨勇（领队）、何家欢、刘勇、王哲、刘果淞、余腾松、李霞、邹斌、刘金琳、庞玲、龚逸涵、王競、曹瞻、赵艳华、刘芳、王文艳、黄止见、张帅、张颖玉等。刘建国对遗址进行航拍、测绘并指导三维影像重建等工作，刘勇指导并参与对部分出土器物的修复和保护。本文线图由刘果淞、王哲、田苗绘制，照片由刘果淞、王哲、刘芳拍摄。邓玲玲、谢安琪、郭晓涛、王星参与了部分出土陶瓷器和砖瓦的整理，陈孝宁、谢崇崐、丁长芬、曹银孝、左志强对出土碑文的识读提出了中肯意见。发掘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昭通市人民政府、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昭阳区文化和旅游局以及太平街道和永乐社区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YS14）的资助。

执笔者 杨勇 何家欢  
刘勇 李霞 邹斌

### 注 释

[1] 闵锐、周然朝：《汉晋朱提县治城》，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406—417页。按：西汉武帝开西南夷后置朱提县，属犍为南部。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设犍为属国，朱提为属国都尉治所；建安20年（公元215年），刘备改犍为属国置朱提郡。晋仍为朱提郡，并延至南北朝时期。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40页。
- [3]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
- [4] 该碑不确定是否为墓碑，其也有可能为记事碑、纪颂功德碑甚至阙，考虑到大类都属碑刻，且古代在这方面的称呼有时并不严格，故此处暂称之为“碑”。
- [5] a.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大关、昭通东汉崖墓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3期。  
b.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昭通田野考古》（之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9—140页。  
c.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水富县文化馆：《昭通水富县楼坝崖墓发掘报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  
d.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昭通田野考古》（之一），第166—181页。  
e.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习水县东汉崖墓》，《考古》2002年第7期。  
f.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水市文物管理所：《贵州赤水市复兴马鞍山崖墓》，《考古》2005年第9期。
- [6] a.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新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29—416页。  
b. 宝兴县文物馆：《夹金山北麓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第11期。  
c.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  
d.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

- 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磷肥厂工地汉墓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2—367页。
- e.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汉代遗存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3）》，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84—441页。
- f.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五勤村汉代遗存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14）》，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57—276页。
- [7]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东坪汉代冶铸遗址的发掘》，《文物》1994年第9期。
- [8] a.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  
b.钱国祥：《云纹瓦当在洛阳地区的发展与演变》，《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c.易立：《四川出土六朝瓦当初步研究》，《考古》2014年第3期。
- [9] 葛季芳、陈本明：《云南昭通东汉墓出土牛头人物出行铜扣饰》，《文物》1981年第6期。
- [10] 丁长芬：《东汉时期昭通朱提狼造铜器相关问题研究》，《昭通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 [11] 马幸辛、覃友刚：《平昌泥龙乡出土汉代铜印考析》，《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 [12] 周克林：《东汉六朝钱树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
- [13]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考古》2007年第5期。
- [14] 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 [15] 同[6]f。
- [16]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17] 傅奠基、唐靖：《昭通简史》，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
- [18] 同[10]。

（责任编辑 李 晴）

## ○信息与交流

### 《唐祖陵》简介

《唐祖陵》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文物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该书为大16开精装本，有正文156页，彩色图版128页，定价390元。

该书聚焦关中地区两座重要的唐代祖陵——永康陵和兴宁陵，发表了相关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资料，提出现阶段对石刻雕凿年代、陵园形制和陪葬墓的学术认识，并收录石刻、唐朝列圣之碑等信息。

永康陵位于陕西三原县陵前镇石马道村东北、侯家村西南，墓主为唐太祖李

虎。永康陵由位于陵园中央偏北处的陵墓封土、内围沟、围墙、外围沟、神道石刻、乳阙等组成，出土遗物以砖瓦类建筑构件为主，另外陵园区内还发现大量唐墓。兴宁陵位于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后排村北侧，南隔渭水与唐长安城相望。墓主为唐世祖李昀。兴宁陵的形制、出土遗物与永康陵相同。上述发现为修正以往学术界关于唐代帝陵制度最初形态的认知、探讨初唐时期陵寝制度的阶段性发展与变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露 箬）